

二十六篇

和青年
朋友
谈心

钱理群 著

东方出版中心

二十六篇——和青年朋友谈心

钱理群 著



东方出版中心
ORIENT PUBLISHING CENTER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二十六篇：和青年朋友谈心 / 钱理群著. —上海：
东方出版中心, 2016.2

ISBN 978-7-5473-0903-2

I. ①二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演讲-中国-当代-选
集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95768号

策划人 郑纳新
责任编辑 张芝佳
责任印制 周勇

二十六篇——和青年朋友谈心

出版发行：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：上海市仙霞路345号

电 话：62417400

邮政编码：200336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720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：300千字

印 张：24 插页 2

版 次：2016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0,001—8,000册

ISBN 978-7-5473-0903-2

定 价：45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：021-52069798

我与青年(代序)*

青年对我的意义

我的第一本随笔集的题目是《人之患》，这是陈平原先生为我命名的，意思是我的最大特点，就是“好为人师”。这是确实如此的：作为“教师”的钱理群，比作为“学者”的钱理群更为重要；也有人评价说，钱理群的讲课比钱理群的文章更吸引人。其实，我的文章与讲课，都是以青年为对象的。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《心灵的探寻》，扉页上就写着一行字：“本书献给致力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人。”差别仅在于写书时，青年是预设读者；讲课时就直接面对青年人，自然更容易激发热情，也就更动人了。

青年不仅是我的学术研究与教学的对象，更是参与者。很多熟悉我的学生与朋友都知道，我的写作是开放式的：我每有一个新的写作计划与构想，就喜欢和年轻人交流。每一个来访者，一坐下来，我就滔滔不绝地谈我的这些新想法——顺便说一点，我和任何人的谈话，谈的都是精神性的话题，在这个意义上，我更是一个精神的存在，这构成了一个特色，但也是一种片面性。这样的和青年人的无拘无束的交谈，其实也是对我的思考的一个整理与提升过程，而年轻人

* 2014年12月20日在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举办的读者见面会上的讲话。

也总会对我的设想提出种种问题与意见，这也就深化了我的思考，他们也在无意中参与了我的思想与学术的创造。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与来访者交谈，我的思考也就越来越成形，这才着手写成讲稿。这又是一个更为系统、自觉的交流，通过课堂讨论与课后作业，学生就更有深度地参与了我的学术研究。最后根据讲稿整理成书时，我总是大量地引述学生的观点，有人在看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《心灵的探寻》时，就发现我很少引用学术名家、大家的论述，却不断引述学生作业里的一些创见。我始终认为年轻人（包括本科生）对于文学常有新鲜的感悟，尽管仅是思想的闪光，但却极具启发性；我把他们的零星发现引入自己的论证体系，就不但给我的著作增添活力，而且对他们的思考也是一种提升：这是真正的共同创造。这几乎成了我的研究方法与习惯，我的每一本学术著作都尽量吸收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，并郑重说明。我可以说不时在关注学术的新发展，每一次发现学术新著、新人都兴奋不已，总是忍不住要引述他们的新创造，以引起学术界的注意，同时也使自己的思考与研究处于学术前沿。我希望自己的重要研究，都具有集大成的意义；当然，这都是建立在个人的独立研究基础上的，引用时的选择也是出于自己的眼光与判断，并且有所改造与发挥。

这样的两大特点——以青年人为对象，以及青年人对我的学术研究的参与，也决定了我的学术的叙述方式与语言风格。我因此自觉采用“演讲体”和“谈话风”的学术文体，追求表达的真诚、坦率，语言的畅达，情感的强度与生命的温度，力戒艰深与纠缠、晦涩。我始终期待自己的学术，能够走出学院，不局限于学术界，而能走向青年，走向普通读者。

青年对我的影响，当然不限于学术研究与教学，更是渗透到了我的生命本体。很多人都对我的身体与精神始终保持着某种青春活力感到惊奇，这或许和我的某些气质有关，但其中最重要的奥秘

还在我始终保持着与青年的密切联系。特别是到了晚年,我已经不可能深入了解社会,就只能借助于青年志愿者这样的群体的帮助。我在一篇文章里回顾我们之间的交往历史时,这样写道:“我心里只存感恩之心,仿佛命运特意眷顾我,让我晚年能够接触到这么多的好人,青年朋友。他们都给了我无尽的生命力量。我这个‘老宅男’正是通过他们,才与现实世界、底层社会保持了或一程度的精神联系;也正是他们不断吹送来的新鲜的生命气息,让我不停地思考,保持了思想的活力。”这里提到了“感恩之心”,这是确实的;更准确地说,我与青年的交往,是一种双向的需要与支援,从不是单向的给予。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,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,谁也离不开谁;但同时又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,谁也不依附于谁。这样的平等与互助,是我所向往的。

讲鲁迅：我和青年联系的精神纽带

有学生回忆说,“在北大,如果你问钱理群是谁,可能得到的一个最简洁的答复就是‘那个讲鲁迅的’”。^[1]我确实几十年如一日地向青年人讲鲁迅,不管外界围绕鲁迅有多少争论,无论有多少人总想把鲁迅和青年隔开,赶出课堂,我始终如一地以充当“鲁迅与青年之间的桥梁”为天职,乐此不疲,老而弥坚。这是基于我的两个坚定不移的信念。其一,“鲁迅的心永远和青年相通”。主要理由有二:第一,“鲁迅是一个‘真的人’”,这也有两层意思:首先,“他敢于公开说出别人不敢说、不愿说、不能说的一切真实;鲁迅恰恰是在人们因为缺乏勇气和智慧而停止思考,满足于似是而非以自欺欺人时,把思想的探索进行到底,从不顾虑将会引出什么‘可怕’的结论,这里所表

[1] 邵燕君:《赤子佛心钱理群》。

现出的正是年轻人所向往的大智大勇的大丈夫气概”。再者，“鲁迅追求真的彻底性，更表现在，他从不向读者（包括年轻人）隐瞒自己内心的矛盾、痛苦、迷惘、缺陷、不足与失误。第二，他敢于面对自身的局限，更无情地批判自己，他从不以真理的化身自居，更拒绝充当‘导师’，他将真实的自我袒露在年轻人面前，和他们一起探讨和寻路，青年可以向他倾诉一切，讨论、争论一切，你可以毫不顾忌地批评他，甚至拒绝他：他是青年的朋友。在年轻时候，能够结识这样一位‘真’的成年人，应该是人生之一大幸”。其二，“鲁迅是现代汉语语言的大师。他的语言以口语为基础，又融入古语、外来语、方言，将汉语的表意、抒情功能发挥到极致，又极富个性与创造性。阅读鲁迅作品，不仅能够得到精神的启迪以至震撼，还能得到语言的熏陶与美的享受。尽管初读时会有些困难，但坚持读下去，自会有自己的发现与感悟，而且常读常新。流连于鲁迅所构建的汉语精神家园，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”（《〈鲁迅入门读本〉后记》）。后来我还说过这样的意思：“人在春风得意、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，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。人倒霉了，陷入了生命的困境，充满了困惑，或者说，对自己听惯了的话，习惯了常理、常态、定论，产生了怀疑，对自己现有的生存状态，产生了不满，希望有新的选择、新的突破，这时就是接近鲁迅的最佳时刻。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：他是另一种存在，另一种声音，另一种思维，因而也就是另一种可能性。”我因此而深信，只要具备两个条件——有一定的文化，又喜欢思考，这样的人，特别是年轻人，迟早是要与鲁迅相遇的。我就接触过许多青年朋友，他们在学校里读鲁迅作品，没有什么感觉，甚至有些排斥；但进入社会，有了阅历，感受到人生的酸甜苦辣以后，再回想起学校读过的鲁迅作品，就有了感觉，进而自觉地读鲁迅作品了。而我所要做的，就是和有这样的要求的年轻人一起读鲁迅，在这一过程中达到心灵的沟通。

我首先是在北大讲，连续十七年，先后和二十一届的北大学生一

起读鲁迅。我在《我与北大》一文里,已经有过详尽的回忆。在退休以后,我就到全国各地的大学,到中学,到工厂,到社会上,到处讲鲁迅,和不同年龄、不同文化、不同身份的年轻朋友一起读鲁迅。这也是出于我的两个信念:一是鲁迅活在当下中国,他是一个现实的存在,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存在,因此,我们读鲁迅,就是在思考现实中国社会人生;二是鲁迅作品是要读一辈子的,每个人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,都会以不同的方式与鲁迅相遇,我的任务是帮助读者找到这样的方式。我因此编选了不同的鲁迅读本和研究读物:《小学生鲁迅读本》、《钱理群中学讲鲁迅》,供大学生读的《鲁迅作品十五讲》,给研究生读的《与鲁迅相遇》,以及提供给社会青年和中老年人的《鲁迅九讲》。而我自己也活跃在其中,我追求的是“鲁迅—我一青年读者”之间的生命的交融。

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

我出生于1939年,按今天流行的说法,应属于“30后”那一代。我最感自豪的是,我与以后的六代青年,都有生命的交集。六代人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,即“40后”、“50后”,“60后”、“70后”与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。

我于1960年大学毕业,经过一番曲折,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。那年我正二十一岁,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,都属于“40后”。我出生在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式大家族,在南京、北京等大城市长大,小学、中学与大学读的都是名牌学校,自己也是以当作家、学者为追求。因此,一下子到了最边远,也最底层的中等专科学校教书,这样的反差实在太大,可以说,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我面前,要如此年轻的我独自直接应对:如何面对现实?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理想?又如何坚持?开始我有不

知所措之感,但冷静下来,就作出了此后决定我的一生的选择:对于我这样的天生的理想主义者,放弃自己的追求是不可能的;但是,面对严厉的现实,我又必须作出某种调整。我一到贵州,当地人事部门就宣告:进入贵州大山,就别想出山。我曾经想考研究生,但由于家庭出身,学校明确表示不准报考。这样,我就必须作好长期(甚至一辈子)待在贵州的准备。那么,我又如何坚持理想呢?情急之中,我突然想起了“狡兔三窟”的成语:是不是也应该将自己的理想分为两个层面。首先是“现实的理想”,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,只要我努力,就可以实现理想。于是,我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:尽管受我的家庭出身的影响,学校对我多有防范,连班主任都不让我当;但总是给了我一个课堂,一个和青年人接触的机会。于是,我决定就以“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”作为自己的现实理想,由此而开始了自觉地充当青年的朋友的人生之路。我不仅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,而且搬到学生宿舍里,与学生同吃,同住,同学习,同劳动。由于我和学生年龄差别不大,因此很快就打成一片,我们一起学习,逛街,踢球,爬山,演戏,办壁报,我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学生,我真的成了最受欢迎的老师。几十年后,当年的学生每次聚会,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,首先想到的就是我,前几年我到贵阳,还有学生从几百里外赶来看我。更重要的是,我自己从与学生的交往,特别是学生的成长中,感到了生命的意义,获得成功感,享受着教师的快乐,从而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。也就是说,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者梦,只是把它作为一个“现实条件不具备,需要耐心等待,作长期准备”的“未来的理想”。因此,在学生睡觉以后,我又挑灯夜读,主要是继续我的鲁迅阅读与研究,现在我还保留着当年所写的数十万字的《鲁迅研究札记》,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“回到北大讲鲁迅”的梦。这是一段漫长的准备与等待,一直等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,我才获得报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,最终回到北大讲台,这一等就是整整十八年。

回顾这段历史,我总要感激我的贵州的“40后”的学生,如果没有和他们休戚与共的生命交织,我早就被现实压垮或变形了,根本不可能坚持十八年的理想,保持生命的本色不变。

但我与“40后”青年学生的交往,我们彼此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:文化大革命一开始,我就被打成了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,许多在我身边的学生都被打成“以钱理群为首的三家村”里的“小牛鬼蛇神”。而尤其让我震惊的是,一个学生竟为我付出了生命!那是一位护士班的叫陈某某的女学生,她其实并不是我的圈子里的学生,只是随着其他同学到我那间小屋坐过一两次,因此连她的面貌我都记不清楚。“文革”开始在批斗我时,她仅是出于年轻人的正义感,在小组会上针对批判我时横加的某一具体罪名,说了一句“上纲上线太高,不符合实际”,就被打成“公开跳出来为反革命钱理群鸣冤叫屈”的“现行反革命”,她想不通,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,压力更大,就投湖自杀了。我为此感到万分恐惧,而且不断进行自我拷问:“即使我真的罪孽深重,与生俱来,也应由自己一人默默承受;为什么偏不甘寂寞,要用青年的热情慰藉一颗孤寂的心,结果却让他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!这岂不是用青年的生命之重换取了自己的苟活之轻?!——我终于发现,并承认:在无辜的青年面前,我有罪!从此,这年轻人的尸体,这有罪感,便如梦魇阴影般永远没有离开过。”在我与青年之间,永远横亘着一座“压在心上的坟”。

或许正是因为这具沉重的尸体的存在,我后来义不容辞地参加了“文革”“造反”队伍,因此走出学校大门,走向工厂、农村,以至军营,接触到了更广大的社会人群和青年人,我的影响也逐渐扩大。于是,大概在1974年左右,我的周围就聚集起了一批爱读书的年轻人,有学生、知青、工人,还有社会青年,年龄在二十岁上下,都是“50后”了。我们这个小群体,大概类似于今天的读书会,“文革”后期是相当盛行的,研究者将其命名为“民间思想村落”。这样的民间聚集,

有两个背景与推动力。一是大家都陷入了精神的困境：我们这些人大都有造反的经历，但最终却发现，“文革”并没有解决我们期待解决的“官僚主义者阶级”的问题，“文革”中产生的以“四人帮”为代表的“新贵”很坏，面对“文革”进入绝境的现实，我们就面临着“中国向何处去，我们（我）向何处去”的问题。我和我的“40后”、“50后”的学生这三代人，都是把中国的选择和命运与自己的选择和命运联结在一起的；而在我们的观念中，中国的问题又是和世界的问题联结在一起的，因此，提出的问题是：“中国—世界”与“我们”向何处去？与此同时，我们又意识到，当“文革”陷入危机，也是一个转机：中国正面临一个巨大变革的前夕；当然，我们并不能预知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，但却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，就是要为这样的不知何时、以什么方式到来，却必然要到来的社会变革作理论的准备。而要作理论准备的第一步就是读书。这就意味着，我们当时是为了一个宏大高远的目标聚集起来读书的；这和我们当时的身份、地位——边远地区、社会底层的、文化程度很低的年轻人（除了我这个大学生之外，都是十几岁、二十几岁的只读过小学和中学的“半大孩子”）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。我们连最起码的书都没有，就只能偷；能够读的就是马列主义、鲁迅的书；而且读书，特别聚集起来读书本身，就有风险：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群人从聚集起来开始，就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特别关注，而且“文革”后期也确实有人因组织读书会而被捕，甚至被处以极刑的。对此，我们都是充分思想准备的：夸大一点说，我们是为追求真理而读书，并且准备作出牺牲的。当然，我们一起读书，也不全是如此严肃，毕竟都是年轻人，大家经常在一起唱歌、朗诵、爬山、游泳、做游戏，甚至谈恋爱。后来，一位朋友曾赋诗一首，描述我们当年的生活：“更难忘，娄山湖畔（这是我所住的地方），登吟《井冈》（指一个雪天的早晨，我们一伙人爬上附近的山岗，齐声朗诵毛泽东的《井冈山》）；陋室聚首，鲁迅文章；朝来暮往，笑

语喧堂。遥望共产主义理想,眼前烧饼和清汤。”可以说,我和“40后”、“50后”两代青年的交往,是真正的理想之交、生死之交。

1978年,我考上北大研究生,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。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,直到今天。这本身就构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我到了北大,闭门读了七年书,到1985年正式开课讲《我之鲁迅观》(在此之前曾代一位老师给81级学生讲现代文学史),接触的就是“60后”、“70后”的青年了。他们或多或少有“文革”经验与记忆,因此和8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有着先天的契合。在《我与北大》一文里,我谈到80年代和“60后”、“70后”的青年一起读鲁迅,课堂上就形成一股“鲁迅—我—学生”心心相印、声气相通的气场,那几乎是以后时代很难重现的。后来这些学生纷纷投入社会,当然不是偶然的。我也因此陷入了和前述“40后”、“50后”一代交往时同样的矛盾心境中:既理所当然站在学生这一边,又为他们可能付出的代价而担忧,更为自己无力和学生一起承担后果而痛苦地自责。这里所暗示的我与青年交往中的有罪感,是延续至今的。我总觉得,我们成年人没有把国家搞好,却要让本应该只是学习的青年学生来担负社会的责任,付出代价,这过于残酷,我们成年人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在2002年退休以前,我在北大的最后一批学生,是80年代上半期,也即1980—1983年出生的,我也就有了机会接触“80后”的青年。但我真正关注与思考这一代人,却要到退休以后。记得是2006年,我应邀到北大演讲,题目就是《如何看待“80后”这一代》。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话题?原因是我看到了《中国青年报》的一个“青年调查”,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一是报告透露,我国“80后”的青年有将近两亿人,而且他们将要或者已经开始接班,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了。二是谈到围绕如何看待这一代人,社会的评价与“80后”的自我评价出现了巨大反差。许多人以“生活离不开网

络”，“重视外表，讲究穿着”来概括这一代人，这也是“80后”可以认可的；但他们又批评“80后”“永远以自己为中心”，“道德观念、是非观念、责任感普遍不强”，“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”等等，这引起了“80后”的不满，因此发出了“请别误读这两亿青年”的呼吁。我的演讲就是响应“80后”，为他们辩护的。我的想法和说法很简单：“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，早就发现，几乎每一代人都对下一代，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。”我举出来的例子是，作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的刘半农，曾写过一篇文章《老实说了吧》。他的“老实话”就是看不惯30年代的青年人，批评他们“不认真读书，又喜欢乱骂人”。我是“30后”，也应该是挨骂的对象；但我读了刘半农的文章就笑了：今天“30后”、“40后”、“50后”，以至“60后”、“70后”某些人不是也在责骂“80后”“不认真读书”吗？连骂的理由也差不多啊！但“历史照样前进：每一代人都被上代人所不满，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，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，以至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”。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：“为下一代人，特别是年轻人担忧，实在是杞人之忧。每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，但既不能看得太重，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。一是要相信青年，二是要相信时间：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。”现在，距离我讲话的2006年已经有八年了，“80后”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，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完全不一样了。而“80后”的某些人又开始对“90后”指手画脚了。这样的历史循环，是非常有意思的。

我也大概从2002年退休以后，和“80后”，后来又和“90后”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。应该承认，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和我熟悉的前几代青年，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。如果说，“40后”、“50后”，是“文革的一代”，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；“60后”、“70后”，是“改革的一代”，关心的主要是思想、文化问题；那么，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，就成长于经济发展的时代、网络的时代，他们最为关心的，是个

人生存、经济问题,首先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。对我来说,最为重要的是我和几代人关系的变化:如果说,“40后”、“50后”和我的年龄与精神气质都比较接近,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,我是把那些贵州青年朋友视为“精神上的兄弟姐妹”的;在“60后”、“70后”青年面前,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老师、父辈的启蒙主义者的角色,但我们之间的交往,还是少有距离的,就像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所说,他们是随时可以闯门而入,和我神聊到深更半夜的。对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来说,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,我的年纪越来越老,已经没有精力和他们过于密切地交往,他们接近我的机会越来越少,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。更重要的是,我已经无法和所有的“80后”的青年作心心相印的交流了。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:青年是不一样的,有睡着的、玩着的,也有醒着的。对“80后”睡着、玩着的青年,我尊重他们的选择,但已经无法和他们对话,他们对我也毫无兴趣,至多保留一点有礼貌的尊敬,这也属于正常。我能够交流的,是鲁迅说的,觉醒的,或要觉醒的青年;所谓“觉醒”,就是在坚持自己时代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时,又有所质疑,希望有新的突破,寻找在物质、精神两个方面更为健全的发展。我因此把他们称为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,既在根本上和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之处,又有自己的时代特色。就在这样的意义上,我这个“30后”就与“80后”的部分青年相遇了。

我们共同的话题是什么呢?这也是我和“80后”青年对话时,谈到的对“80后”的看法的第二个方面。年轻人问我:你认为我们这一代存在什么问题?我的回答是:“你们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,从小就以考大学,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;现在如愿以偿,进了大学,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,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。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的缺失的问题。这个问题,我们也有,‘上帝死了’,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。我们这一代

曾经以‘革命’为自己的信仰，现在我们却发现革命也有许多问题，需要反思、反省，也就有一种失落感。不过，我们已经老了，可以按照原先的惯性生活，而诸位不行，一切都这样糊糊涂涂地过下去，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。”^[1]这样，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重建我们的理想、信念，以至信仰，就成为我和“80后”的新理想主义者进行精神交往的聚合点。如前文所说，我需要通过与生活在社会底层、具有活力的年轻人，主要是两个群体——青年志愿者与青年读书会的朋友的联系，借助他们的思想力与行动力，给自己不断补充生命力量；我也可以把我及我们几代人的的人生经验教训，以及我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研究、观察与思考，告诉年轻人，为他们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提供参考。

我对年轻人的建议，通常有两条：一是要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，自由读书，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，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与理想，打下知识与精神的底子。二是在可能范围内，适当参加社会实践，特别是到底层、到农村去，了解中国国情，与中国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，这是建立信念与理想之根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也是我自己，我们这几代人的成长之路，人生基本经验；在我看来，这对今天的中国青年，也还是有意义的。

现在，回想起来，退休后的十二年来，我和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的青年，主要讨论了以下五个思想与精神命题，也可以看作是前述意见的一个深化和展开。

（一）“沉潜十年”

“真正有志气的青年，应该把目光放远一点，不要迷惑于眼前的一时一地之利，更应该摆脱浮躁之气。真正有力量、有自信的人是

[1] 参看本书《承担，独立，自由，创造——漫谈〈民国那些人〉》一文。

不会追求那些表面的炫目的浮光的”，“要沉潜十年”，“沉潜到民间、底层，沉潜到生活的深处，生命的深处，历史的深处”，“沉潜十年，必然是苦痛的沉默的十年，而‘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’（鲁迅语）。无论个人，还是国家、民族，都是如此。”^[1]

（二）“认识脚下的土地”

“我们现在面临‘釜底抽薪’的危险：当人们，特别是年轻的一代，对生养、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一无所知，对其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，厮守其上的人民，在认识、情感上产生疏离感、陌生感时，就在实际上失落了不仅是物质的，更是精神的家园”，“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，更是自身的存在危机：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，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，成为无根的人”，“正是出于这样的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忧虑，因此想发出一个呼吁：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！”^[2]

（三）“想大问题，做小事情”

“这是将思想的天马行空与做事的脚踏实地结合起来，将由于对自己的信念的坚守而表现出来的思想的彻底、激进，与现实操作中的低调行事结合起来，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张力”，“这样做，既可以使自己的日常生活为理想之光所照耀，于是所做的小事也就被赋予了一种诗意；同时这样的理想的追求又可以落实到日常具体生活中，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，从而避免了空谈与无所事事。而在内心世界里，又可以在总体的焦虑中获得每一个生命瞬间的踏实感。”^[3]这正

[1] 参看本书《我们需要农村，农村需要我们——中国知识分子“到农村去”运动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》一文。

[2] 《《贵州读本》前言》，见《贵州读本》，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。

[3] 《面对21世纪：焦虑、困惑与挣扎》，2003年。

是所谓的“低调的现实的理想主义”：“想大问题”，即是坚持大的社会关怀、人文关怀、底层关怀，这是对前辈理想主义的继承；但“坚持和平、渐进的改革，着重点滴的力量，从小事做起”，这又显示了新时代的理想主义的特色。^[1]

（四）“静悄悄的存在变革”

当下中国社会，特别是年轻一代，普遍存在焦躁、牢骚和怨愤的情绪，又不甘于无所事事，怎样摆脱这样的困境？“从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，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。以建设你自己，作为建设社会的开始”，我们“就按照自己认定的新的价值观念、道德观念，自己行动起来。在这个追逐物质享受的消费社会里，我们这一群人尝试物质简单、精神丰富的生活方式；在许多人奉行极端利己主义，拒绝任何社会责任和承担时，我们这一群人尝试利己利他、自助助他的新伦理；当许多人奉行将他人视为敌人的丛林法则，进行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时，我们这群人尝试着把他人当作兄弟姐妹的志愿服务；在充斥着谎言的社会里，我们这一群人则反其道而行之，努力生活在真实里”。这本身就是一种独立意志的表现。“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的，它就具有内在的力量，现在我们又组织起来，形成集体力量。只要我们做得好，就会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力，就会像滚雪球那样，不断扩大。从改变自己的存在，到改变周围人的存在。”^[2]

（五）“健康地、快乐地、有意义地活着”

“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由‘物质主义’的时代向‘后物质主义’的

[1] 参看本书《一百块钱，有多轻，又有多重？——雪灾救助活动的启示》一文。

[2] 参看本书《为生命给出意义——谈“静悄悄的存在变革”》一文。